

彼得罗夫事件 的真象

(澳) W. J. 布朗 著

北 京 編 譯 社 譯

(內 部 讀 物)

群 衆 出 版 社

彼得罗夫事件真相

(澳) W. J. 布朗著

北京編譯社 节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61.12

EDITED AND COMPILED BY
W. J. BROWN
THE PETROV CONSPIRACY UNMASKED
本书根据 CURRENT BOOK DISTRIBUTORS
SYDNEY 版本节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部发行组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148(社)26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 \frac{3}{8}$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30千字 定价0.17元

彼得罗夫夫妇和三年行动计划

1951年2月5日，苏联大使馆的两个新工作人员来到了澳大利亚。一个是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彼得罗夫，另一个是他的妻子伊芙多吉亚·阿列克谢叶芙娜。

不到几个月，澳大利亚保安警察机关就特别对彼得罗夫进行了研究，认为他可能成为一个背弃祖国的叛徒。

保安警察当局这种深谋远虑，后来证明是出奇的正确。差不多整整三年之后，在1954年2月27日那一天，彼得罗夫和澳大利亚保安警察机关的一个官员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谈妥了一桩出卖祖国的肮脏买卖。

孟席斯政府付给他的叛国代价是赃款5,000镑，还有“一辈子享福的诺言”；后一句话是彼得罗夫公然亲口说出来的。

1954年4月3日彼得罗夫背叛了苏联。几天以后，他的妻子也步了他的后尘。

接着，彼得罗夫夫妇便在孟席斯政府、澳大利亚各家报纸以及斯普莱和李查兹两人所掌握的保安警察机关的协助下，大肆招摇，声称他是苏联在澳大利亚组织的一个“广大的苏联间谍网”的“间谍首领”。

他们所宣扬的故事是捏造的。彼得罗夫夫妇根本不是什么“间谍首领”，同时也没有什么“广大的苏联间谍网”在澳大利亚活动。

澳大利亚保安警察当局对于彼得罗夫这个人能够这样地料事

如神，幕后究竟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呢？为什么在他几乎是刚刚到达之后，他们就立即认为他有卖国的可能呢？

以后陆续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澳大利亚保安警察当局几乎是在彼得罗夫踏上澳大利亚国土的时刻起，便行动起来了。

从1951年年初开始，保安当局便拟定了一个“彼得罗夫行动”的总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彼得罗夫一直被培养了三年。简直太凑巧了，这个计划恰好在1954年联邦选举前夕酝酿成熟。

“彼得罗夫行动计划”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和镇压战后几年来日益壮大的澳大利亚工人运动的总策略直接配合的。

到了1951年，臭名远扬的美国式陷害手法早就屡见不鲜地被用来对付劳工运动了。这种手法在彼得罗夫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

1949年3月，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先生以煽动叛变罪被控。他的“罪行”只不过是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对记者说：“澳大利亚工人欢迎苏联的武装力量追击侵略者。”因此，他竟被监禁了十八个月。

1949年5月，维多利亚州的重要共产党员密勒又被人诬告，硬说他强姦了一个小姑娘。后来，这个的小姑娘自己承认，是有人指使她捏造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来进行诬告的。因此，这个案子便告破产，当局也只得急忙将它掩饰过去。

-
- 澳大利亚秘密警察组织的正式名称是“澳大利亚保安情报总署”，署长是军国主义者查理斯·钱伯威尔·弗勒·斯普莱准将，副署长是乔治·罗纳德·李查兹。

附注：所有的记录引文均系摘自“皇家间谍活动调查委员会”正式记录的印刷本。所有的报告引文均摘自“皇家间谍活动调查委员会”1955年8月22日的正式报告。

就在同一月中，各大报业辛迪加开始把一大笔款子交给维多利亚州共产党叛党分子沙普雷，要他写文章攻击共产党。于是“维多利亚州共产党活动皇家调查委员会”便成立起来了。

同年8月，澳大利亚煤矿工人为了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举行总罢工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一次陷害共产党员的事件，企图诬告他“把一个男子推下了渡船”。这个男子名叫陶伯逊，后来他承认，当时他是自己跳下海港去的，事后，他就把他捏造的这篇鬼话打电话报告了警察局。

1950年9月，据说悉尼的主要发电厂——本晶朗电厂的一个锅炉里发现了沙子。各家报纸便把这件事说成是“共产党的破坏活动”，后来查明这种诬蔑是毫无根据的。

1951年7月再次企图进行诬蔑。当时发现停泊在悉尼“库克士校”海军船坞中的一艘军舰上的电线被人割断了。于是，又有人责难共产党在进行“破坏活动”。结果查明，原来割断电线的是舰上的一个水手，目的是想延迟军舰启航的时间，以便和他的女友见面。于是“共产党阴谋”的说法又一次破产了。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他们不断地利用这样的、那样的、形形色色荒诞不经的事件，企图造成一种局面，以便采取重大的行动。首先宣布共产党非法，然后再向劳工运动的各个环节进攻。每当澳大利亚工人为了提高实际工资，为了争取改善或维护待遇而进行罢工时，报纸上都大书特书，称之为“红色阴谋”。到了1951年，也就是彼得罗夫来到澳大利亚的那一年，孟席斯政府就公开号召人们支持它的政策，企图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且要强迫工会中经由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全部共产党员领袖下台。

孟席斯政府扬言要在1951年中宣告共产党为非法的企图，正

如以后事实所说明的一样，是失败了。尽管这次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另一个规模极大的陷害事件却在酝酿中。

“彼得罗夫行动计划”正在进行着。

这个计划不仅是为了打击共产党，也是为了打击工党。这种打击，在1954年选举的整个期间内，以及选举以后很久一直在进行着。

澳大利亚的联邦议会反对党——工党领袖伊瓦特博士总结一句说得好：“彼得罗夫案件的无耻程度，将在历史上大大地超过了1924年英国选举前夕，反对党为了击败英国工党政府而制造的臭名远扬的‘季诺维也夫信件案’。”*

同时，这个长期计划还是进一步和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在1951年3月所提出的“三年内发动战争”的时间表十分密切地配合起来的。

事实上，彼得罗夫这出戏恰巧是在美国叫嚣着要干涉印度支那、要对越南人民解放军使用原子弹、因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四伏的时刻开场的。

后来孟席斯政府设立了一个“皇家间谍活动调查委员会”，并

* 1924年英国选举时，保守党当时所面临着的政治失败局面，正和孟席斯先生在1954年的情形一样，于是他们便利用现已臭名远扬的“季诺维也夫信件案”，制造了一场“间谍恐怖”。信上的发信地点是莫斯科，日期是1924年9月15日，收信人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要求在英国军队中建立“细胞组织”，并准备叛乱。这是一件十分拙劣的伪造品。发信机关的名称根本不对，信上写明是从“第三共产国际”寄来的。事实上共产国际有时叫作“第三国际”，其实，“第三共产国际”的名称纯是历史上的大谎话。因为第一国际组织时还没有共产党的存在。把季诺维也夫也错误地说成是主席团主席。另外，作为书记在信上签字的是库西宁，而当时的书记则是科拉罗夫。由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未能说明此信是伪造的，结果保守党竟在选举中获胜。

由孟席斯总理亲自慎重遴选了三个法官来主持。^{*} 这个委员会可以充分表明麦卡锡主义的卑劣手段已经输入到澳大利亚来了。

这个耗资14万镑的调查委员会尚未结束，便被一系列的政治上和司法上的丑事弄得狼狽不堪了。

从1954年5月17日起到1955年3月31日止，为时十一个月，开庭126天，一共传讯了119个证人，这个目的在于揭露一个“间谍网”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最后不但连一个“苏联”间谍也没有找到，反而有两个特务被揭发出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个人正是属于澳大利亚保安警察机关的进行反苏活动的特务分子。

虽然这几个委员所作的最后报告，不负责任地污损了一些澳大利亚公民的清白声誉，可是他们最后也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没有理由对任何人或任何组织起诉。

他们还被迫不得不作出结论说，澳大利亚共产党是和间谍活动毫无关系的。

* * *

彼得罗夫到达后没有四、五个月，保安当局的官员们便指派了一个特务，专门对他加以注意。这项任务的目的并不是对苏联大使馆一个新到人员作一般泛泛的了解。早在1951年上半年，这个特务便奉到密令，要他在会到彼得罗夫时，立刻对彼得罗夫是否有背叛祖国的意向进行了了解。

* “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听取证词以及凭证词作出结论等方面，和一般法庭相似。近年来澳大利亚曾多次成立各种事件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这些“调查委员会”在使大澳大利亚公众的心目中，显得客客气气，是威权不高的。

这些“皇家调查委员会”多是贻日费时，开支浩繁的机构，常常是收获不大，甚至是完全得不到肯定的结果。也有几次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成立的。

不管彼得罗夫夫妇来到澳大利亚时心里有过什么打算，正如前面所說的，彼得罗夫到达后，立刻就成为保安警察机关的一个职业特务的密切研究对象，这个问题现在已是一件确凿的历史事实了。

这个特务就是住在悉尼麦贵利街的麦凯尔·拜罗古斯基医生。

拜罗古斯基是誰？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前妻巴特里西亚·拜罗古斯基曾以“我嫁了一个特务”为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开头的几段里，就对拜罗古斯基的人品有所说明。

她在文章中写道：

“我第一次遇见麦凯尔是在1941年。当时我是悉尼一家很大的零售商店的经理的妻子，他是一个和善、勤快的人，他的薪金一年有几千镑，足够我们两人和一个儿子过着富裕的生活。

“后来有一个面带稚气的穷小子闯进了我的生活中来，他住在乌鲁木鲁一间阴暗的房子里。

“那时我已33岁，他才24岁。

“这个古怪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人物使我失去了主宰。我抛弃了我的家庭，嫁给了他。这次婚姻使他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周围也有了許多声势赫赫的朋友，而我呢，倒变成一个孤独穷困、漠不相关的寄居者了。”

他的前妻进一步描写拜罗古斯基說：他易于激动，喜欢哭泣，并且常常声称要自杀；他一再自夸“手腕灵活”；他让她出去工作，賺錢来供他学医，可是他一旦毕了业，并且由于干上了秘密警察

的特务这行副业而大賺其錢的时候，便遺棄了她。”

关于拜罗古斯基这个人，伊瓦特博士和华德先生（代表东悉尼的工党議員）在議會中就曾說过：“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无賴。”

关于拜罗古斯基在皇家調查委員會上作証这件事，墨尔本的律師希尔先生也曾說过：“出席作証的拜罗古斯基是一个撒謊家，是一个伪善者，是人类的耻辱。”

拜罗古斯基是一个波兰移民，是1941年6月24日乘日本郵船“东京丸”从日本来到澳大利亚的。

希尔先生在彼得罗夫事件調查委員會上談到拜罗古斯基来澳大利亚以前的經歷时說：

“这个家伙是在1941年納粹侵入苏联时离开苏联的，这真是一件絕无仅有的巧合。而他到日本去的时候又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同年他又离开日本来到我国。”

“我根据納粹进攻苏联前夕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論断：当时他是一个德国間諜。后来，当他到日本去、又从日本到我国来的时候，已是一个日本間諜；日本战败后，他又自动地参加了联邦調查处。”

拜罗古斯基自知他以往的經歷和保安机关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1945年3月里的一天，拜罗古斯基走进了悉尼皮特街117号联邦調查处的办公室。

他在这里向調查处的官員巴恩威尔表示願意效劳。

* 拜罗古斯基太太的遺載文章“我嫁了一个特务”曾于1955年6月在几家澳大利亚报纸上同时发表。本章和以后各章中所引的各节均摘自1955年6月1日至11日的“悉尼每日电讯报”。

安机关便特別要求他設法查考一下“彼得罗夫是否有任何留在澳大利亞的意向。”

聯邦議會反對黨工黨領袖伊瓦特博士的職員达尔齐尔和格隆德曼兩人所請的辯護律師薩里萬先生也曾緊緊地反復詰問關於他和彼得罗夫初次見面的情形。

薩里萬先生問：“你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你就認為他是一個可能變節的人嗎？”

拜羅古斯基答：“是的，我認為他是可能的。”

薩里萬先生問：“那一次他到底說了些什么或者做了些什么，才使你產生這樣想法呢？”

拜羅古斯基答：“從他的一舉一動上，從他的態度上都可以看得出來。我注意到，他很喜欢那個場合里的人，他很能自得其樂。一個大使館的官員在陌生的環境中是很少這樣的。我也注意到他對堪培拉大為贊賞，他說他喜欢堪培拉，喜欢這裡的氣候，也喜欢園藝。這些言論都和一個大使館的官員，尤其是蘇聯大使館的官員的一般談吐有所不同。”

正如許多政治評論家後來指出的，根據一個人喜欢堪培拉，喜欢它的氣候，喜欢園藝，就認為他有叛國的可能，真可說是滑天下之大稽。

結合 1951 年以後所發生的國際大事來研究彼得罗夫事件，自然就能看出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插曲，而是和預計在 1953 年年中達到高潮的“冷戰”以及國際反蘇挑釁的惡毒策略直接配合着的。

“三年內发动战争”的最終时刻

当国际局势依然为战争的阴霾所籠罩时，澳大利亚国内所发生的許多事件便具有了一种有趣的和相互关联的背景。

在彼得罗夫夫妇到达堪培拉仅仅 9 天之后，两位知名人物便相繼来到。他們的駕临表明了澳大利亚在“冷战”中的作用是加强起来了。

1951 年 2 月 14 日，一架飞机把孟席斯总理載回堪培拉。同一天，另一架飞机又載来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孟席斯总理是出席倫敦联邦总理會議后归来的，归国途中曾經訪問了華盛頓。

孟席斯在回来的当天，就立即召开了一次盛大的記者招待会。

他对到会的記者說，他帶回了一項把澳大利亚放置在“半战争”基础上的計劃。

在堪培拉的另一个場合中，杜勒斯先生也接見了澳大利亚的記者，他对美国准备在那个完全名不符实的“对日和約”下重新武装日本的建議加以說明。

孟席斯先生在和杜勒斯先生秘密商談以后，宣布了一項使整个澳大利亚都感到震惊的声明。

他在空气緊張的州总理會議上說：“澳大利亚必須在三年之內作好战争准备，一天也不能拖延。”

他又在会上宣布：1951—1952 年度的联邦預算將撥出两亿多鎊作为国防費，而 1951 年預算中国防費約为一亿鎊，1950 年为 8,400 万鎊。

孟席斯先生宣称：“三年内发动战争”的计划将在1951年内开始实施，预计到1953年6月前完成。

也许这真是一件巧中又巧的事情，在1953年6月这个孟席斯先生的战争时间表上的预定时刻竟成了“彼得罗夫行动计划”里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关键。

1953年6月将是保安警察机关活动最紧张的时期，他们设法贿赂共产党员，恫吓在职的和卸职的公务人员；总之，这些活动不外是为九个月以后于1954年在彼得罗夫事件调查委员会上出现的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打下基础。

但是1951年绝不是澳大利亚反动势力万事如意的一年。

孟席斯政府提出要采取断然手段限制公民自由，作为其“三年内发动战争”计划的必要序幕。但这一企图，在1951年3月10日受到了严重的挫败。

这一天，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全体法官会议以六对一的票数，否決了解散共产党法案*。

唯一赞成这个法案的著名人物是首席法官約翰·拉扎姆爵士，他曾任保守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监察长（該党后来改名为澳大利亚统一党，其后又改称自由党）。

法官魏伯先生提出一项重要論断反駁說：“联邦既然沒有证据說明共产党是第五纵队，因此，整个法案便是无效的。”

孟席斯先生所憎恨的，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工党，他毫不掩饰这个事实。

当孟席斯对新闻记者談到了高等法院的裁決时，他怒冲冲地說：“尽管就培拉有工党中的契富雷—伊瓦特派存在，公众（应讀

* 解散共产党法案是孟席斯政府为了解散澳大利亚共产党而拟訂的一项法律，其中并广泛地規定了“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工会职务。

作孟席斯政府)必須拥有这种权力,否則也必須爭取获得它。”

公民投票——摒棄法西斯主义

正如孟席斯断然表示的,他对高等法院所給他的挫折,并不打算就此罢休。

到了1951年6月,他又在堪培拉召开了一次州总理的特別會議,他在会上要求各州把必要的权力移交給联邦政府,以便制訂法律彻底打击工会和共产党。

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两州拒絕了这个要求。

孟席斯先生仍不甘心,他于7月間又援用宪法修正案,举行公民投票,要求澳大利亚人民授权联邦議會,以便重新制定解散共产党的法案。

1951年9月22日,这天是澳大利亚人民对这个問題进行投票的日期。

9月22日,当“冷战”还在疯狂进行着的时候,澳大利亚人民給全世界的民主与和平力量打了一針兴奋剂。新南威尔士、維多利亞和南澳大利亚三个州以及絕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民都拒絕了法西斯主义(根据澳大利亚宪法規定,孟席斯政府要想通过这项法西斯式的法律,就必须获得全澳大利亚多数选民和多数州的贊成票。)

孟席斯先生說:“我要繼續斗争。”

一星期以后,孟席斯先生的保安警察机关的首脑們在悉尼召見了特务拜罗古斯基医生,要他加紧对彼得罗夫进行工作。

“夺取极权主义的权利”的企图虽未得逞,但“三年內发动战

爭”的時間表却是依然存在的。因此必須另謀對策，來對付那些抗議捐稅日重、物價日高、收入日低的人們。這種江河日下的景況是和每年耗費兩億鎊的擴軍备战計劃無法分開的。

公民投票失敗後的反應——“加緊執行 彼得羅夫行動計劃”

公民投票剛一失敗，保安總署副署長李查茲便立即親自出馬參與了“彼得羅夫行動計劃”。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61年8、9月間，拜羅古斯基又周期性地向他這種秘密警察特務的不可見人的勾當要求加錢。

拜羅古斯基這時與彼得羅夫相識不過才兩三個月之久，可是二人已經成為莫逆之交，經常一起吃喝，一起出入悉尼各夜總會。

“有時我帶他去吃晚飯或去夜總會，彼得羅夫喜歡去夜總會，”拜羅古斯基寫到這個時期時這樣說。

拜羅古斯基在對彼得羅夫的任务上，最初得到的報酬是一星期四鎊。他對這個報酬不滿意。他曾對保安機關的联系人喬夫·斯考特抱怨說：“我整天里跑夜總會，可是得到的津貼卻將夠吃小攤的。”

由於加錢沒有指望，拜羅古斯基便打電話通知斯考特說，關於彼得羅夫的任务他要放棄不干了。

拜羅古斯基立即被叫到斯考特家里去談話。李查茲本人在那兒等着他。

李查茲馬上明白地告訴了拜羅古斯基說，他親自過問“彼得

罗夫行动计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解决拜罗古斯基将要从中取得多少好处这种小问题。

拜罗古斯基写道：“商谈不久，钱就成了次要的问题，中心话题便转到彼得罗夫这人的身上了。”

这次会谈的结果，拜罗古斯基得到了一项权利，他可以把吃喝玩乐等拉拢彼得罗夫所花的费用实报实销。

拜罗古斯基自鸣得意地说：“这个时候从已有的迹象表明，保安总署对于我工作上的进展情况已经开始重视了。”

1951年末，即拜罗古斯基和李查兹9月间会见以后两个月，督导拜罗古斯基工作的任务就由保安机关主管“颠覆”活动的部门转移到反间谍部门去了。

手段——色情晚会和酗酒

“彼得罗夫行动计划”进入了1952年，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国际局势比1951年更形险恶。

“冷战”在继续进行中。澳大利亚保安警察当局在1952年把“彼得罗夫行动计划”直接作为冷战的一部分，同时稳步地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远的部署。

到1952年初，特务拜罗古斯基已经和彼得罗夫夫妇成了莫逆之交。

1952年的头几个月，拜罗古斯基定期和彼得罗夫见面，并把彼得罗夫的情况报告给他的保安警察机关的主子。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1952年，显然就是争取彼得罗夫彻底叛变而缜密部署的一年。